

第四章 結論

在本論文最終章中，吾人將回顧研究問題與研究結果，對於研究本身之限制提出建議並延伸研究意涵。本章的進行主要分為兩個部份，在第一部份，作者將回顧研究成果並對研究限制提出具體建議。而第二部份則是對於研究本身進行總結。

第一節 研究成果回顧與研究限制建議

正如本文緒論所示，本研究意在探求針對兩岸互動議題，個人基於「理性利益」的考量，是否將壓倒其「感性認同」的牽掛？而另一方面「開放利益又是如何認知？」。作者依據此二個問題變項，設立兩組順序對數勝算模型，並推論出十組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的結果，似乎有些出乎意料之外，民眾對於兩岸開放的利益認知其來自於感性因素所使然。其中【假設 1-1】到【假設 1-5】的部份是全然不成立的，「年齡世代」、「學歷階段」、「階級劃分」、「經濟區域」以及「部門利害」等變數均未達統計上得顯著水準。而感性層面因素中身份認同為「台灣人」的民眾相對於有著雙重認同的民眾傾向認為完全開放兩岸經貿交往將不利於自身的經濟利益，同樣的傾向支持泛綠陣營的民眾對於完全開放兩岸經貿交往對自經濟利益影響的看法也是抱持著負面態度。另一方面，台灣意識越強的民眾則認為完全開放的結果將使得自身經濟利益更加不利。

而在影響民眾兩岸經貿交往立場的因素中，感性面因素所造成的影響較理性面因素為多，感性面因素中「身份認同」、「政黨認同」以及「台灣意識」三者都相當程度的影響民眾的兩岸經貿立場，理性面因素則僅有「自評利益」與「競爭能力」對民眾的兩岸經貿立場有所影響。

其中，在理性層面因素方面，「自評利益」達統計上得顯著水準，其中「自評有利」的民眾傾向更加開放兩岸經貿交往，而「自評不利」的民眾則傾向加強管制與大陸的經貿交往，整體而言與本文【假設 2】相符。而「競爭能力」結果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並與本文【假設 6】相符。

而在感性因素方面，「身份認同」變數中，自認為「台灣人」的民眾相對於「都是」的民眾傾向加強管制與大陸的經貿交往，而自認為「中國人」的民眾相對於「都是」的民眾，在兩岸經貿立場上雖未達統計上顯著差異，但其估計係數在方向上是與【假設 8】的預期是一致的。在「政黨認同」中，支持泛綠政黨的民眾傾向加強管制兩岸經貿交往，而支持泛藍政黨的民眾在統計檢定上並未達顯著水準，但其估計係數的方向卻是與【假設 9】一致的。最後，在「台灣意識」方面，台灣意識愈強的民眾愈傾向加強管制兩岸的經貿交往，此合乎本文【假設 10】之預期。

然而有趣的是「自評利益」此變項雖在模型二中得顯著水準，但根據模型一的結果看來，自評開放利益的認知則是根源於感性因素所影響，其乃為理性面的虛假認知。一般而言「趨利而避害」的論述作為理性選擇的出發點，其本身即具備相當合理且強勢的解釋基礎，但當兩岸經貿交往不再是一個簡單的經貿問題時，感性因素反而成為自評利益的主因。換言之，民眾對於兩岸經貿交往立場所抱持的態度，基本上是深受感性因素所影響。

在本研究進行的過程中，不免將遭遇限制，其中最為困擾的則在於吾人對於「理性利益」的判別問題。理性選擇理論基於「自利」與「理性計算」的假設而存在，作為自利行動者本身，其「自身」判別利害的正負關係應該才是研究所需的最佳資料，而在本研究中的理性層面變項，僅有「自評利益」一項為受訪者的自身理性計算。而這個問題的根源實乃是受限於先天的資料結構所導致，在調查訪問的標準化原則下，吾人在訪問的過程中勢必無法也禁止針對諸如「階級劃分」、「經濟區域」、「部門利害」、「競爭能力」對於兩岸經貿立場，做特別的自評

訪問。

倘若要細究受訪者本身對於這些因素的「理性計算」，解決之道則必須調整個調查計畫架構並重新設計問卷，或者另起特別研究計畫方可完善。前者在計畫經費有限的窘境下，必須衡量測量問卷長度以利訪問進行、並顧及成本，而在有限篇幅的問卷題目中，為求兼顧所有計畫主持人之研究興趣，勢必會對某些問題做部份取捨。而後者對於沒有大量研究經費與人力奧援的研究者而言，基本上是天方夜譚。故此，作者只好退而求其次，依據受訪者的條件進行中立客觀的分類，將資料重新編碼成符合研究架構所需之變項。吾人對此問題之建議則為，或者輔以針對理性自評因素與感性認同因素之田野調查資料，將有助於研究推論之信度，然而這個補救作法，在作者有限的時間與精力限制下，目前尚未能得以實行，盼日後有朝一日能夠具體體現。

此外，作者在「部門利害」方面的歸類問題，一方面在資料結構的限制下，個人所屬就業單位部門並無詳細且明確的資訊得以參考，因此吾人僅能就其職業屬性加以歸類，應用於部門利害上，將有可能造成推論誤差擴大的情形，另一方面，在部門利害重新建構的過程中，其利害所屬的分類指標目前仍缺乏經驗研究的佐證，因此作者的解決方法只得大量參考「部份相關」之研究文獻以及兩岸各大經貿研究單位之統計數據，秉持良善學術精神，仔細斟酌、反覆推敲的進行歸類，然而當日後有更多的相關調查資料與經驗研究投入其中之際，這個問題將可迎刃而解。

第二節 研究展望與總結

最後在研究展望與後續研究建議方面，吾人以爲當前兩岸關係結構仍屬「政治疏離、經濟融合」之態勢，當兩岸交往的理性面因素之重要性猶未得知、感性面因素仍處緩慢提昇且尚未失衡之當下，短期兩岸基本態勢不變。然若放眼將來，隨著兩岸經濟發展差距的縮小，台灣當局賴以抗衡對岸壓力的經濟因素優勢漸漸喪失，若逐步發展下去則兩岸可能走向統合，而這樣的局勢目前尚未發生的理由，在本文中清晰可見，其原因乃在於感性因素的影響。此外，隨著兩岸逐日開放，兩岸經貿互動衝擊牽動台灣南北政治版圖，經濟利害直接聯繫政治利害的效果就本文看來並未得到證明。就本文看來，當經濟自由主義者大肆倡導加速開放互惠互利之際，隱身於保護主義背後所操作的這些「親中」、「愛台」、「中國人」、「台灣人」的感性政治符號，正默默的發揮作用。

在「理性」與「感性」兩相背離的兩岸關係結構中，當全球化突破了民族國家和具體地理界線，非官方之交流日益綿密，實現時間和空間的流動化之同時，台灣與中國大陸皆籠罩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必須準備從傳統工業主義向資訊主義過渡轉折，台灣內部的個體也從而增加了尋求認同的機會與空間（李英明，2001）；另一方面兩岸共同加入 WTO 之後，兩岸的投資貿易將從單向走入雙向，而且不再限於物資互通，資金及人員的交流形成物流、金流與人流並存的局勢，此將相當程度的改變民眾心中的「理性估算」。因此，吾人將無法忽視兩岸人員流動的影響。若兩岸人員的互動，果能逐步改變台灣民眾的認知，驅其支持兩岸交流的擴大，則兩岸統合的聲音，將可望持續壯大。

展望未來，在理性與感性的研究架構下，其連綴兩者中更爲細膩的理論建構部份，唯有賴展開大規模的「微觀層次」觀察以及更多經驗資料的投入，方得以蹇續發展。隨著兩岸逐日開放，跨越兩岸的交流當將不再只出現於以個人爲單位的親屬、商業界、文教界之間，當兩岸社會各團體得以自由流動，更多的社群連

綴往返於彼我兩岸。吾人對於兩岸問題的「通達程度」將可望整體提升，而此間是否影響民眾心中的兩岸經貿交往立場，抑或改變自評利益的認知，將成爲未來吾人矚目的焦點。

就當前情況看來，攸關經濟利益的經貿交往議題置於兩岸之間，其結果看起來似乎就不那麼的純然理性，取而代之的反而是複雜的感性情感認同，個人對於自評利益的認知其實仍是由感性因素所決定。參照西方經驗，吾人同樣的發現了「象徵政治」存在於台灣民眾的兩岸交往立場。當前兩岸關係中感性層面的堅持抵銷了彼岸經濟層面的吸引而維持現狀，經貿融合所可能導致的政治統合效果未明。但可預見的是隨著兩岸交流逐日擴大，理性因素的影響將日益明確，如此何者將主導兩岸未來則不得而知？唯本研究初步發現，台灣民眾的兩岸經貿立場決定於其自身的感性認同價值，則此是否又將有具體而微的表現？亦或連綴兩岸的社群成員當其內心認同與現實環境發生嚴重衝突時，則又是將如何折衝？這些都將成爲日後吾人關注的焦點。當然本文分析架構依然存在部分缺失，然此嘗試盼能得拋磚引玉之效，期待日後有更多的資料與研究投入其中。